拟上市银行不良双升压力陡增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截至4月11日，A股15家IPO排队银行中，西安银行、兰州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和重庆农商行5家银行发布了2017年年报数据。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受宏观经济环境及监管趋严影响，银行资金成本明显上升，排队上市的中小银行受此影响净利润增速呈两极化发展，例如重庆农商行净利润同比增长达12.59%，青岛银行则同比下降8.9%。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公布业绩的排队银行仍面临较大资本压力和不良指标上行风险。为降低贷款集中度风险，西安银行、兰州银行等地方银行纷纷加快跨区域业务布局，但短期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净利增速分化

截至4月11日，15家进入A股IPO审核排队序列的银行中，西安银行、兰州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和重庆农商行5家银行更新了2017年年报数据。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2017年底，上述5家排队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为2341亿元、2708亿元、3063亿元、4358亿元、9058亿元，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西安银行和兰州银行增速相对较慢，同比增长分别为7.4%、5.2%；另外3家H股上市银行均实现两位数增速，郑州银行同比增速最高达19%。

此外，5家排队银行净利润增长水平分化较大。青岛银行利息净收入和净利润均下降；郑州银行利息净收入下降但净利润同比上升；另外3家银行上述两项利润指标均上升，其中重庆农商行净利润同比增幅最大，达12.59%。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昆平认为，不同银行净利润增长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银行之间资产端收益率和负债端成本率不同，如果银行贷款收益率相对较高，低成本负债占比大，息差大，净利润增速优势就更加明显。

在周昆平看来，银行的负债成本要看其客户结构，有的银行客户结构不稳定，需要通过发行各种理财产品吸纳资金，成本就相对更高。“有的银行公司负债成本较高，也表明其公司客户结算户较少，难以形成低成本资金沉淀，依赖同业拆借，成本较高。”

据5家排队银行年报显示，计息负债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影响利息净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成本率看，3家已在H股上市的银行中，重庆农商银行个人客户存款和公司客户存款成本率均最低，且都低于2016年水平；郑州银行和青岛银行公司存款成本率均高于2016年水平；青岛银行个人客户存款成本率虽低于2016年，但与同业相比仍较高。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表示，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负债端高成本压力，因区域性较强受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银行竞争格局影响，不同银行之间银行存款成本的差别也较大。他还指出，很多中小银行要跨区域布局新网点扩大业务规模，多以贷款为主，存款难以跟上的情况下更依赖同业拆借，随着监管趋严同业成本上升，这也导致了这些中小银行负债成本升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受国内外宏观形势影响，整体利率水平逐步上升，相比大型银行来说，中小银行既没有网点优势，也没有资源优势，资金链一旦收紧，其成本上升暴露更加明显，尤其金融机构竞争较激烈的地区，成本上升压力更大。

银行分析人士指出，储蓄成本由社会成本和服务成本两部分组成，银行通过引入新技术创新产品及服务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储蓄成本。“互联网和移动端渠道的服务和产品创新关键是要增强客户黏性，形成客户集聚效应，才能真正起到降低零售储蓄成本的效果。”

重庆农商行指出，2017年银行客户存款利息支出85.43亿元，同比增加了4.60亿元，增幅5.69%，主要是有效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客户存款平均余额同比增加所致。

近年来青岛银行在借助金融科技加快零售市场的拓展步伐。青岛银行在年报中表示，2017年银行进一步推动零售业务IT系统建设，持续践行接口银行战略，通过多渠道交叉营销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并强化新业务研发和营销，推出二维码收款及二手房资金监管业务，促进储蓄存款增长。

已公布年报的A股IPO排队银行业绩对比 （单位：亿元）

	西安银行	兰州银行	青岛银行	郑州银行	重庆农商行
资产规模	2341	2708	3063	4358	9058
资产规模同比增长	7.40%	5.20%	10.18%	19.03%	12.78%
净利润	21	24	19	43	90
净利润同比增长	4.35%	11.85%	-8.86%	7.14%	12.59%
不良贷款率	1.24%	2.09%	1.69%	1.50%	0.98%
不良贷款余额	13.89	29.64	16.59	19.26	33.01
最大十家贷款及垫款总额	95.89	76.50	98.76	91.61	246.79

数据来源：银行年报

资产质量压力不减

除西安银行外，兰州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和重庆农商行4家排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依然呈现“双升”趋势，资产质量压力仍在。

据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合并口径下西安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24%，较2016年底下降0.0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为13.89亿元，比上年底增加1.49亿元。

西安银行在更新的A股首发招股书中指出，贷款资产质量受区域经济影响呈下降趋势但整体风险状况稳定。

根据招股书显示，2017年西安银行调整优化信贷结构，积极介入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项目，加快限制类行业贷款的退出，加强风险管理，实施信贷组合管理，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对敏感行业贷款实施限额管理，同时加强存量不良贷款处置管理，加大呆账核销力度，实现不良贷款率下降。

5家已经公布年报的排队银行中，有4家银行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均较2016年底有所上升，其中兰州银行不良贷款率及不良余额上升幅度都位居高位。

据兰州银行更新的A股招股书显示，截至2017年底，该行公司贷款不良率为2.44%，较2016年底上升0.4个百分点；个人贷款不良率为1.14%，较2016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发展趋势来看，连续三年来该行公司不良率持续上升，而个人贷款不良率则持续下降。

兰州银行表示，受甘肃地区经济形势影响，部分企业经营承压，还款能力下降，且个别单笔金额较大的贷款形成不良贷款影响。

2017年，兰州银行贷款客户兰州港联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主要建设的港联第一大道项目被有关部门要求限期拆除，导致形成不良贷款，期末余额为3.78亿元，占该行2017年不良贷款增长金额的50.74%。

从贷款集中度看，西安银行、兰州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和重庆农商行5家排队银行2017年银行最大十家单一客户贷款和垫款占该行资本净额比分别为45.37%、33.86%、29.21%、22.01%、30.87%。

从区域及行业集中度看，上述5家排队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也集中在当地区域。西安银行表示，为了降低业务区域集中的风险，银行一直大力推动跨区域经营战略，但因银行设立于西安市并且长期深耕西安市及周边地区市场，短期内主要业务及运营仍集中在西安地区及周边地区。

同处西北地区的兰州银行与西安银行一样，也在积极推动跨区域发展。兰州银行表示，已在酒泉市、天水市等甘肃省其他地市设立分行并设立甘肃兰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本行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取得监管部门批复后，结合本行目前的经营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跨区域经营，实现贷款投向地域更加多元化。”

亳州药都农商行IPO关口被罚 资本补充再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柯瑾 张荣旺 北京报道

刚刚提交了IPO申请的亳州药都农商行，因主要监管指标异常收到罚单，罚金30万元。4月8日，原银监会网站公布了上述处罚决定，决定显示，亳州药都农商行未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对同业投资及理财业务实施穿透管理，未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准确计量风险、计提资本，造成主要监管指标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3月23日，亳州药都农商行刚提交IPO申请。在此次受罚之前，亳州药都农商行近一年内已经领过四张罚单，分别涉及漏交存款准备金、信贷资金及结算账户管理不规范、向监管部门报送主表与实际有差异等问题，且该银行不良贷款率连年持续攀升，资产质量及风控问题凸显。

监管指标受关注

据证监会网站披露信息显示，亳州药都农商行是今年首家递交A股上市招股书的中小银行，且在哈尔滨银行及徽商银行撤回IPO申请的短短几天后“逆势而上”，其业务结构、资产质量、公司治理以及风险管理自然受到业内外的关注。

此次亳州药都农商行受罚涉及主要监管指标异常，未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对同业投资及理财业务实施穿透管理，未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准确计量风险、计提资本，造成主要监管指标异常。“这是规避资本充足指标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监管套利行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有大行人士称。

根据亳州药都农商行招股书，2014年至2016年，该行资本充足率三个指标呈连续下降趋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5.29%、8.44%以及8.02%；资本充足率为16.31%、9.42%以及9.08%。其中2016年资本充足率指标未达到过渡期损益要求，而这也正是该行此次受到监管处罚的直接原因。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上市准备及受罚事件致电亳州药都农商行，该行表示暂不接受对外采访。

该农商行招股书中显示，已根据监管要求进行整改，并解释原因如下：第一，2016年末发行的机构保本理财产品未纳入表内核算，未计提相应的风险加权资产。第二，2016年末同业投资未按照穿透原则对所投资的特定目的载体穿透至底层，未全部按照底层资产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第三，该行投资的部分资产管理计划底层资产带有杠杆，但该行未将杠杆部分纳入合并范围，并计提相应的风险加权资产。

事实上，去年银监会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要点就明确指出，金融机构是否存在同业业务、票据业务、理财业务未按照“穿透性”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准确进行会计核算、风险计量并足额计提资本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提供同业增信，或通过借助券商、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通道方，设立定向资管计划、有限合伙股权理财融资等模式。

银行“补血”冲刺

截至2017年9月，亳州药都农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充足率为8.21%、8.21%以及11.15%，已符合管理办法、过渡期通知的监管要求。

且该行表示，已制定资本管理规划，拟采取内源性和外源性资本补充。其中外源性措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上市后通过发行优先股、可转债等进一步补充一级资本，另外在监管许可的范围内发行二级资本债券以及创新融资方式等对资本进行补充。

据悉，截至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5%，资本充足率为13.65%，较2016年底均略有上升。随着表外回表压力的显现，一些中小银行或未上市的银行“补血”压力加大。

已披露的2017年上市银行年报显示，去年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同期普遍有所下降。对于一些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的银行来说，目前已进入“补血”的冲刺阶段。

今年2月以来，监管部门连续发文，鼓励银行进行资本补充。2月27日，央行就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发布公告，拓宽了新型资本补充工具的方式；银监会于2月28日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下调拨备红线，对银行资本补充也起到间接影响；3月12日，银监会、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工具创新。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实际使用的合格资本工具类型主要包括普通股、优先股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分别属于核心一级资本工具、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此外，上市银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也可以起到对资本的补充的作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

鲁政委认为：“可转债、优先股的发行人主要为上市银行，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人包括全部银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非上市银行，可以使用的资本工具类型比较有限，并且资本工具的条款灵活度不够高、不便于商业银行按一定的时间计划补充资本。”

“随着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支持，未来资本工具的品种将更为丰富、条款设计将更为灵活，解决当前资本工具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可能弥补目前可转债的转股不确定性问题，‘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可能为非上市银行提供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渠道。”鲁政委表示。

上市城商行贷款“回归本源” 非息收入差异大

本报记者 王柯瑾 张荣旺 北京报道

在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的态势下，2017年上市城商行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差异。截至4月12日，A股和H股上市的城商行中已经有10家发布2017年年报，《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其中6家银行营收较上年增加，其余4家却有所下降。

记者发现，在利息收入中，上市城商行信贷结构已悄然调整。在信贷投向领域，上市城商行相较于去年同期，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方面均有所增加，而在房地产行业有缩减趋势。

除了利息收入，在非息收入方面，上市城商行表现差异较大，尤其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上，出现较大分化。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城商行立足于当地市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及自身定位不同，业务特色差异性较大，非息收入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信贷结构优化 投向偏好实体

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作的重要内容，其合理与否既关系到银行的营运效益，也关系到资产的安全。在利率市场化以及监管政策的影响下，城商行在战略规划和业务结构上均有所调整。

截至4月12日，A股和H股上市的城商行中已经有10家发布2017年年报，包括宁波银行、锦州银行、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徽商银行、青岛银行、盛京银行、天津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在信贷结构上普遍较上年有所调整。

“信贷结构的优劣在于银行的信贷投向有多少进入了实体经济或高新技术领域，又有多少进入了楼市、股市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对城商行而言，是否立足于当地，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衡量标准之一。”某城商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

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上述10家城商行中有两家银行房地产行业信贷投放有所增加，其余7家均为下降趋势。其中，锦州银行与宁波银行信贷投向调整最为明显，房地产信贷投放分别下降4.5%以及4.49%。

除房地产行业外，10家城商行信贷投向制造业、租赁与服务业务以及批发零售零售业的趋势逐渐增加。以宁波银行为例，2017年该行个人贷款占比最高达30.5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为16.16%，比上年增加1.82%；制造业占比为15.5%，增幅达1.1%；而房地产开发占比为3.33%，降幅为4.49%。

宁波银行表示，一方面该行持续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支持，加强对制造业、商业贸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主动调整信贷结构，严格控制集团客户授信总量，坚守监管部门对政府平台性贷款的“三条红线”，限制产能过剩、行业前景不明朗行业的信贷投入，信贷资产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前述城商行信贷部门总经理告诉记者，其所在的银行从去年起全面暂停产能过剩行业以及政府平台性贷款。“目前，根据监管形势和银行自身发展规划，信贷事业部已经按行业类型细分，单独成立了医疗健康、装备制造、文化体育等信贷部门，根据自身的优势精准投放信贷资金。”

生息资产收益下降 非息收入分化

记者梳理发现，生息资产收益率较低且普遍下降，是上市城商行的特点之一。10家已发布年报的城商行中，锦州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最高，为6.21%。上述银行中，除盛京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为5.24%，较上年增加0.47%外，其余8家城商行生息资产均较上年有所下降，且有7家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不足5%。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告诉本报记者，2017年城商行生息资产收益率略有下降，主要受“营改增”价税分离等因素影响。“2017年整体来看，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是企稳的，有些银行可能由于之前一些高收益的资产在报告期内到期了，导致年报数据不高，未来预计2018年银行资产收益会逐渐增加。”

伴随着利息收入下降、息差收窄，非利息收入成为很多银行利润增长的驱动器。

记者统计发现，10家城商行中6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上年增加，其中中原银行增幅最大，达71.4%；其余4家均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盛京银行降幅最大，达15.7%。

年报显示，郑州银行2017年，实现代理及托管业务手续费收入为12.83亿元，同比增加7.43亿元，增幅达137.59%。郑州银行表示，主要由于该行持续发展代理及托管业务，客户数量不断增加及业务量持续增长所致。

同时，天津银行2017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由上年度的14.02亿元增加到20.34亿元，增幅达45.0%。据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津银行理财服务费为12.29亿元，较上年度增加约4亿元。“理财业务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天津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由此影响非息收入增加。”某城商行计划财务部门人士分析称。

在廖志明看来，城商行非息收入分化较大属于正常现象。“整体来看，2017年银行业非息收入表现一般：一方面，根据监管政策，银行代销保险、公募基金以及其他资管产品的收入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在强监管态势下，银行理财规模扩张也受到一定影响，理财收入增速放缓，导致有些银行的非息收入出现波动。”

多位银行业人士表示，监管对同业业务的限制，对过去依靠通道业务实现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城商行来说冲击不小，很多城商行的资产业务在监管倒逼之下“回归本源”。

另一位城商行业务人士对记者表示，除了贷款投向的调整外，该银行正致力于探索多元化利润收入，“把前些年忽略但很重要的国际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以及资产托管等业务纳入了今年的发展规划，并大力探索咨询类业务等中间业务的利润点”。